

顾 炯



# 徐志摩傳略



湖南人民出版社

顾

炯

徐志摩詩略

湖南人民出版社

徐志摩研究室

# 徐志摩传略

顾 焰

责任编辑：周楠本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湘潭市彩色印刷厂印刷

\*

198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89,000 印张：4.25 印数：1—4,700

统一书号：11109·393 定价：0.88元

新书目：86—15



徐志摩遗像（1925年）

徐志摩手迹（1927年）

近来起烟瘾日甚，但生肺病，吸烟已  
经像皮一张硬便的畸形的膜，总想要打  
破它，正想事与愿违，新解雨伞店舖新  
日高店，想老兄有空，听到，还有一片雪景，  
公司，等你大姐她们出来忘的，老兄不笑语  
吗？初试，跌倒，我不可知，老兄有何  
教？老兄是喝醉了，即大作，和喜不  
胜，寄去。

志摩敬候



徐志摩之墓（浙江硖石）



中学时代的徐志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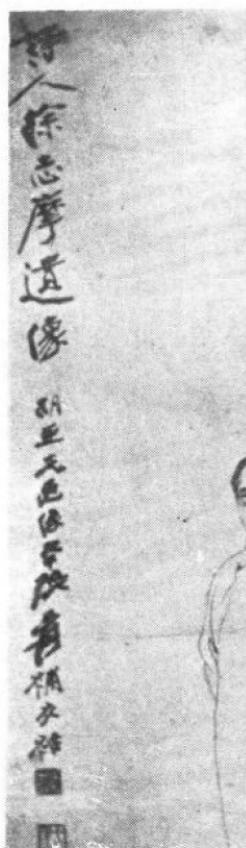


在美国学习时期的徐志摩



徐志摩和夫人张幼仪

徐志摩和陆小曼



徐志摩画像（胡亚光画像、张大千补衣裾）

## 目 录

一	思想启蒙 .....	1
二	美国之旅 .....	11
三	剑桥风情 .....	20
四	“奇异的风” .....	30
五	广交名流 .....	39
六	怒海泛舟 .....	49
七	彷徨歧路 .....	57
八	新月初起 .....	65
九	重游欧陆 .....	76
十	“迎上前去” .....	88
十一	诗界探索 .....	98
十二	流入颓废 .....	112
十三	落叶飘零 .....	124

## 一 思想启蒙

十九世纪末叶，随着帝国主义的不断入侵和清王朝海禁的开放，外国资本和西方的科学文化一齐涌进了古老的中国，一方面使中国社会进一步半殖民地化，同时也刺激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嫩弱幼芽，尤其是沿海各省的工商业得到了较快的发展。浙江省海宁县有个硖石镇，地处上海与杭州之间，为浙西重镇。皖米销浙，以此为交易之所；江宁织绸，以此为采购之地。硖石有东西二山，一川从中流过，故又名硖川。这里山川形胜，风景秀丽，文化比较发达，商业相当繁盛。山上有宝塔亭台，水边有寺庙学堂，绿树掩映，暮鼓晨钟，递送着悠远而又深长的吟咏……

一八九七年一月十五日（农历一八九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徐志摩出生在硖石镇保宁坊的一户富商人家。父亲徐申如是一位生财有道、经营有方的商人，在浙江颇有名望，在地方更是“执一乡之牛耳”。“他是一位民族资本家，思想比较开朗，在本乡浙江海宁县硖石镇，除了主持经营旧式的徐裕丰酱园、裕通钱庄、人和绸庄等外，最重要的是创办了蚕丝厂、布厂、硖石电灯厂，还有双山习艺所等。他在浙江与上海的金融实业两界，也参加了一些事业。他任硖石商会会长的时间较长”<sup>①</sup>。徐申如广有家财，又附庸风雅，喜交名流。

<sup>①</sup> 陈从周：《记徐志摩》，载《新文学史料》一九八一年第四期。

他还是南通民族资本家张謇的好友。徐志摩说：“我查过我的家谱，从永乐以来，我们家里没有写过一行可供传诵的诗句”（《猛虎集·序》）。他在一九二六年七月八日的家书中也说：“徐氏固商贾之家，没有读书人”。显然，这是一个已经都市化的封建工商业家庭。这个“商贾之家”正是中国的封建经济日渐衰微、资本主义经济有所抬头的产物，在当时的维新变法风潮中呈现着一种发展的趋势。在这个资产阶级化的封建家庭里，徐志摩既受到封建诗书礼教的陶冶，同时也初步得到了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的熏染。

徐志摩初字槱森，小字又申，谱名章垿，笔名有诗哲、南湖、谷、海谷、鹤、云中鹤等。志摩这个名字是后来起的，起这个名字的原因说法不一。一说是徐志摩在一九一八年赴美留学时他父亲取的，缘由是志摩幼年时有个叫志恢的和尚给他摸骨算命，说：“此人将来必成大器”。父亲望子成龙心切，因志恢和尚摩过，为了应这“必成大器”的预言，所以在送儿子出国时更名为志摩<sup>①</sup>。另一种说法是，这名字是徐志摩在英国决定改志文学后自己改的。“也许是‘康桥景色’吧，更可能是拜伦的余风，终于使志摩改了志，志在摩诘，他做了诗人”，“志摩这名字是他自己改的”<sup>②</sup>。这说法也不无道理，查徐志摩一九一九年在美国克拉克大学学习时的成绩报告单，上面用的仍是“徐章垿”的名字。不管怎样，“志恢和尚‘摩顶’也好，‘志在摩诘’也好，都算是一种‘言志’与希冀，只是含义是很不相同的，反映了父子俩不同的个性和价值观念，故可各存其说，聊供备考。

① 顾永棣：《诗人徐志摩》。载《人物》一九八一年第五期。

② 惠泉：《徐志摩琐忆》。载香港《七十年代》一九八零年第一期。

徐志摩自小过着优裕的公子生活。他虽系庶出，但因是家中的独子，又是长孙，加上自小天资聪颖，成绩优异，故深得祖母和父母的宠爱。徐志摩的祖父徐星匏于一九零二年病故，享年七十二岁。徐志摩回忆说：“我初次遭逢亲属的大故，是二十年前我祖父的死，那时我还不满六岁。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可怕的经验，但我追想当时的心理，我对于死的见解也不见得比华翁的那位小姑娘高明”（《我的祖母之死》）。“华翁”是指英国诗人华滋华斯，他在一首题为《我们是七人》的小诗中，描写诗人有次遇到一个八岁的小女孩，问她有几个兄弟姐妹，她说我们是七个，两个在城里，两个在外国，还有一个姐姐一个哥哥，在她家附近的教堂的公墓里埋着。每天晚上，小女孩总是带着点心到墓地去，吃着，唱着，唱给长眠在地下的哥哥姐姐听。在孩子的心里，还分不清生与死的界限，表现出一种可爱的童稚之心和纯朴之情。徐志摩的祖母是在一九二三年才去世的，生前对徐志摩十分宠爱。小时候，徐志摩常常“早上走来祖母的床前，揭开帐子叫一声软和的奶奶，她也回叫了我一声，伸手到里床去摸给我一个蜜枣或是三片状元糕，我又叫了一声奶奶，出去玩了，那是如何可爱的辰光，如何可爱的天真……”这种童年的欢乐自然是值得珍惜的，但毕竟不是人生的全部，于是徐志摩很有感慨地说：“这次祖母的大故，老家庭的生活，给我不少静定的时刻，不少深刻的反省”（《我的祖母之死》）。

徐志摩四岁的时候入家塾读书，在保宁坊那幢古老的四进楼房里念起“子曰诗云”来了。塾师孙荫轩称赞他“初学聪明超侪辈”，大概不是过誉之词。徐志摩念了七年家塾，这种学习生活无疑是枯燥的，但同时也打下了比较扎实的国学

基础。硖石是一个河港纵横的热闹市镇，徐志摩居住的第四进楼房就紧挨着一条叫沙泗浜的小河，“人家尽枕河”、“水港小桥多”的水乡景色是迷人的。晨雾还未消散，咿呀的橹声就划破了小河的宁静，开始了一天忙碌喧腾的生活。徐志摩在念书之余，常常趴在窗口，凝望着河面上来来往往的小划船，倾听着那诉说各自的欢乐和辛酸的硖石方言，感到格外亲切。有时候，他把几个铜板放在一只系着长绳子的竹篮里，从临河的窗口吊到船上，提上来的是半篮又甜又粉的开锅熟老菱。徐志摩家里有一个叫家麟的老佣人，勤劳质朴，会种菜，善栽花，懂得很多有趣的知识，还会唱动听而又难懂的“赞神歌”，能把一部《岳传》说得那样引人入胜。徐志摩在一篇以他为模特儿的短篇小说《家德》中这样写道：“他讲得我们笑，他讲得我们哭，他讲得我们着急，但他再不能讲得使我们瞌睡，那是学堂里所有的先生们比他强的地方”。

一九零七年，徐志摩进硖石开智学堂。这是科举制度废除后硖石兴办的第一所新式学堂，开设的课程有国学、数学、英文、自然、修身、体育诸课。“徐志摩成绩为全班冠，有神童之目，申如公常出示其文而引以为乐”<sup>①</sup>。开智学堂紧挨着西山下气势恢宏的西寺，西寺前面有一块开阔的空地，逢年过节时这里热闹非凡，做小生意的、唱“小热昏”的、要把戏的、变魔术的、烧香的、卖唱的、算命的、要饭的……光怪陆离，各色人等，构成了一幅病态社会的缩影。硖石并非世外桃源，自小养尊处优的徐志摩自然无法理解半封建半

---

① 《徐志摩全集·年谱》，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此《年谱》系根据陈从周一九四九年在上海出版的《徐志摩年谱》修订重编。

殖民地的社会性质，但也开始初步接触了畸形的贫富悬殊的生活现实，并对他今后的创作道路产生过积极的潜在影响。徐志摩在开智学堂时的作文《论哥舒翰潼关之败》，论述“哥舒之计，诚以逸待劳，而有胜无败上策也。奈何玄宗昏儒，信任国忠，惑邪说而沮良谋，以至于败。故曰：潼关之失实国忠而非哥舒也。”立论有据，行文流畅，古文已有相当好的根底，剖析问题也有独到的见解。学堂的体育老师是武备学堂学生出身，有强烈的反清思想，常常带领学生到西山上去讲述“扬州三日”等抗清故事，也在一定程度上启迪了徐志摩的爱国主义感情。

一九一零年春天，徐志摩离开家乡，进入杭州府中学学习，跟郁达夫是同班同学。郁达夫曾在一篇回忆文章里这样描摹过少年时代的徐志摩：“尤其使我惊异的，是那个头大尾巴小，戴着金边近视眼(镜)的顽皮小孩，平时那样的不用功，那样的爱看小说——他平时拿在手里的总是一卷有光纸上印着石印细字的小本子——而考起来或作起文来却总是分数得得最多的一个”。“无论在课堂上或在宿舍里，总是交头接耳地密谈着，高笑着，跳来跳去，和这个闹闹，结果终于会出其不意地做出一件很轻快很可笑很奇特的事情来吸引大家的注意的”<sup>①</sup>。徐志摩的性格活泼、俏皮、随和，但学习十分用功。杭州府中学规定，成绩第一名的学生任级长，徐志摩曾连年担任级长。他爱好自然科学，曾在该校刊上发表过《镭锭与地球之历史》的论文，对天文学尤感兴趣，常常仰望星空，冥思神游于浩渺的太空。

---

<sup>①</sup> 郁达夫：《志摩在回忆里》。载《新月》第四卷第一期。

徐志摩爱好文学，兴趣广泛，少年时代就表现出浓厚的政治意识。一九一三年，他在杭州一中（即辛亥革命前的杭州府中学）校刊《友声》上发表的一篇题为《论小说与社会之关系》的文章，就明显地体现出这种倾向：

若科学社会警世探险航海滑稽诸小说，盖有裨益于社会，请备言之：科学小说，发明新奇，足长科学知识；社会小说，则切举社会之陋习积弊，陈其利害，或破除迷信，解释真理，强人民之自治性质，与社会之改革观念，厥功最伟；警世小说，历述人心之险恶，世事之崎岖，触目别心，足长涉世经验；探险航海小说，或乘长风，破万里浪，或辟草莱，登最高峰，或探两极，或觅新地，志气坚忍，百折不回，足以养成人民之壮志毅力，至若滑稽小说，虽属小品文字，而藉诙谐以讽世，昔日之方朔髡奴，亦足以怡情适性，解愁破闷。凡诸所述，皆有益小说也，其裨益社会殊非浅鲜，有志改良社会者，宜竭力提倡之。

不难看出，这和梁启超在一九零二年提倡“小说界革命”的那篇名作《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无论在立意和内容上都很相似，就是那种“纵笔所至不检束”、“笔锋常带感情”的文风也颇为酷肖。在新文化运动发轫之前，一个十六岁的少年能突破轻视小说的传统偏见，并着眼于“改良社会”的要求，注重于文艺的社会功能，应该说已是难能可贵的了。

一九一五年夏天，徐志摩在杭州一中毕业后即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住在同乡蒋百里家里。同年秋，回硖石与宝山县官宦之家的张幼仪女士结婚，因而辍学。当时徐志摩十九岁，张幼仪十六岁。张幼仪出身于有财有势的名门望族，其兄张

君励、张嘉璈（公权）是政界、金融界的要人。据说，玉成这门亲事的就是张嘉璈。徐志摩还在杭州一中读书时，张嘉璈是督理浙江军务的朱瑞（介人）的秘书，有次张嘉璈去学校参观视察，看到徐志摩的国文考卷，颇为激赏，乃以妹相许。徐家虽是富商，但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远远不如张家，徐志摩的父亲对这门亲事是满意的。至于徐志摩和张幼仪，说不上有多少爱情的基础，但把张幼仪说成“很有点象《红楼梦》里的王熙凤”，跟徐志摩“天真无邪、轻快磊落的性格可谓冰炭不相接”<sup>①</sup>，未免褒贬失当和过于偏颇，也缺乏根据。事实上，徐志摩和张幼仪婚后的生活还算是比较融洽的，直到他们的第二个儿子彼得夭折后，徐志摩还在一篇悼亡散文中这样写道：“就是你妈，彼得，她也何尝有一天接近过快乐与幸福，但她在她同样不幸的境遇中证明她的智断，她的忍耐，尤其是她的勇敢与胆量……”（《我的彼得》）。至于其婚变，对徐志摩来说，是有着更为复杂和深刻的思想根源的。

徐志摩在结婚后改入上海浸信会学院暨神学院（即沪江大学前身），学习的课程除中国文学和英国文学外，还有中外历史、圣经、物理、化学、数学和公民，成绩大多在九十分以上。一九一六年秋天，徐志摩转学至天津北洋大学念法科的预科，成绩突出：英国文学八十八分，中国文学九十分，世界历史九十八分，法律基础九十分，逻辑与心理学八十六分。一九一七年，北洋大学法科并入北京大学，徐志摩又在北京大学修了一年政治学，同年还加修法文及日文。一九一八年夏天，徐志摩在北京拜见了刚刚退出政界的梁启超，成

① 顾永棣：《雷与虹》，载《西湖》一九八一年第三期。

了他的入室弟子。

徐志摩对梁启超仰慕日久，尽管这时候的梁启超早已经历了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短暂的进步时期而成为一个落伍者，但在徐志摩的心目中仍然是一个“舆论界之骄子”的伟岸形象。梁启超对徐志摩的影响是多方面的，可以说是他的第一个思想启蒙老师。在《志摩日记》中有这样的记载：“读伍公先生‘新民说’及‘德育鉴’，合十稽首，喜惧愧感，一时交集，《石头记》宝玉读金钗之‘螃蟹咏’而曰：‘我的也该烧了’。今我读先生文亦曰：‘弟子的也该烧了’。”这里提到的《新民论》和《德育鉴》都是梁启超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适应时代潮流宣传资产阶级革命启蒙思想的重要作品，是对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大张挞伐的战斗檄文，也是对西方资产阶级民权学说和民主自由热情称颂的赞歌。尽管梁启超本人在一九零三年以后在政治上由改良派变成了保皇派，但他所宣扬的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曾经在马克思主义输入中国之前影响过许多志士仁人，启迪了一代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梁启超在《新民说》中猛烈抨击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并较早地提出了中国人民的国民性及其改造的问题。他说：“国之有民，犹身之有四肢五脏筋脉血轮也。未有四肢已断，五脏已瘵，筋脉已伤，血轮已涸，而身犹能存者。……欲其身之长生久视，则摄生之术不可不明；欲其国之安富尊荣，则新民之道不可不讲”。他还明确地宣布：“要之四书六经之义理，其非一一可以适于今日之用，则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也”。这种“虽临我以刀锯鼎镬，吾犹敢断言而不惮”的豪迈气概和勇敢精神，曾使徐志摩佩服得五体投地。一九二九年梁启超逝世后，徐志摩称颂他“是唯一无愧于中国文明伟大传统的

人”，有着“无与伦比的”“伟大人格以及多方面的天才”，说“他在现代中国历史上带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以个人的力量掀起一个政治彻底的思想革命，而就是因着这项功绩，以后接着来的革命才能马到成功”<sup>①</sup>。语虽多溢美过誉之辞，但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长久维系着两人师生之谊和知己之交的共同基础，即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思想体系。

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是伴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而形成的，它带来了我国近代史上一场轰轰烈烈的启蒙运动，成为我国旧民主主义革命进程中一个重要的思想环节。在“资产阶级的新文化和封建阶级的旧文化的斗争”中，梁启超等改良派曾以“资产阶级代表们所需要的自然科学和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作为思想武器，向不适合资本主义发展的封建上层建筑展开了冲击。但由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特别软弱，又由于世界资本主义已进入了帝国主义时代，“这种资产阶级思想只能上阵打几个回合，就被外国帝国主义的奴化思想和中国封建主义的复古思想的反动同盟所打退了，被这个思想上的反动同盟军稍稍一反攻，所谓新学，就偃旗息鼓，宣告退却，失了灵魂，而只剩下它的躯壳了。”<sup>②</sup>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史上一位有着广泛影响的传奇人物，在变法维新运动和跟封建顽固派的论战中，他是一位英姿卓然的英勇战士，然而在二十世纪初革命派和改良派的大论战中，他又成了鼓吹保皇的绊脚石；辛亥革命后，梁启超的政治面目变幻莫测，但一以贯之的则是他那改良主义

---

① 徐志摩致恩厚之信（一九二九年三月五日）。

② 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